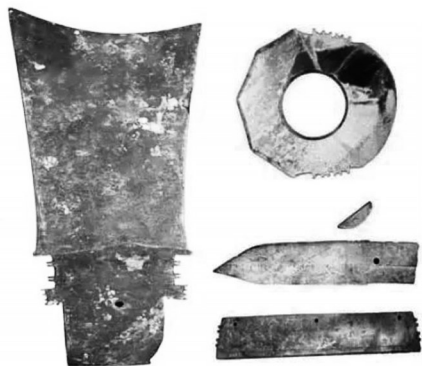


【新刊】

礼以玉成

“探索上古玉文化，聚焦中国精神的玉之品格。”远在七千多年前，嘉兴马家浜的先民们就已经在使用玉器了。玉器是先秦时期重要的身份标志，玉器的使用则是当时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的新作《礼以玉成》(副题：早期玉器与用玉制度研究)汇集了作者多年来对史前和夏商周三代玉器及用玉制度的研究成果，分“玉之辨”“玉之用”“玉之埋”和“玉之史”四个主题，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三个维度，对早期玉器和玉文化等诸方面做出了具有深度的综合考察，揭示玉器所蕴含的礼制传统和政治文化内涵。孙庆伟参与了多处重要先秦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上古玉器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对先秦玉器与玉文化得出了确实而透彻的认识，详尽介绍了中国古人的玉之品格、玉之精神。



二里头玉戚(右上)与牙璋(左)

夏商周：德玉传统的确立

《礼记·表记》载孔子之语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是说夏人已然开始重人事而轻鬼神。而如上文所分析，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盛行的正是反映王权的史玉传统，如此似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支持龙山时代晚期已然进入夏王朝的说法。

如果以更无争议的二里头文化论，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中玉戚与牙璋无疑占据了最为显著的地位。戚为钺类，最有可能源自生产工具类的斧类器物，但二里头文化中的玉戚究竟源于陶寺或山东龙山文化，还是来自豫西地区的史前传统，如灵宝西坡墓地的同类器物，并不容易遽断。

相比之下，牙璋的出现则可谓石破天惊，这种造型奇特的器类必然是出于某种礼仪需求而特意设计的，因此它只可能来自一个源头而不会是不同区域各自发生的。就目前材料而言，虽然豫西地区出土牙璋的数量及其年代均居于弱势地位，但笔者依然坚信所谓牙璋就是夏后氏的核心礼器——玄圭。随着夏文明的强势扩张，玄圭也散布到四夷，如陕北、山东和成都平原。

汤放夏桀，殷商王朝对夏代玉器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夏代的牙璋被商代的玉戈所取代。牙璋是夏人的玄圭，而玉戈则是商人的玉圭。经过夏商王朝的更替，圭作为主礼器的地位得到继承，但在具体形制上又有创新，这是夏商礼制损益的具体表现。而当中原地区的牙璋被玉戈所取代，牙璋这一器形却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中顽强地存在，甚至不惜将典型的商式玉戈改制为牙璋，堪称是“礼失求诸野”的极佳典范。更重要的是，随着玉戈(圭)地位的进一步稳固，玉钺(戚)在商代趋于式微，无论在数量还是体量上，商代玉钺均远逊于同时期的玉戈。不仅如此，商代玉戈似乎已经有了等级差别，身份地位越高者，其所拥有的玉戈体量也越大，如目前长度最长(96厘米)的一件商代大玉戈即出土于盘龙城李家嘴M2中，而该墓则是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

概言之，史玉传统在夏商两代得以稳固与发展，其标志就是玉圭(具体器形即牙璋与玉戈)逐渐成为压倒一切的主礼器；与此相应的是，玉琮这种历史悠久的巫玉在夏商时期则趋于消亡。圭兴琮亡的背后正是王权对神权的压倒性胜利。

武王克商于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不在于殷周王朝的更替，而在于周公的制礼作乐以及由此奠定的中国文化大传统中的礼乐基因。礼既兴，则礼器作。虽然自夏代以降，青铜鼎彝已经成为贵族们的新宠，但严格地讲，鼎俎豆皆皆是行礼之器，而非敬献给神灵的礼物，事神求福的礼器依然非玉莫属。

如按文献记载，周代的玉礼器主要是“六瑞”和“六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穀璧，男执蒲璧。”又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

器之色。”所以《周礼·春官·典瑞》载典瑞的职责为“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周礼》之所以将“瑞”和“器”对举，就是要显示二者的区别。

如依《周礼》的说法，六瑞其实只是圭、璧两类器物，而六器则包括圭、璋、璧、琮、琥、璜等六种器物。验之考古材料，周代最核心的玉礼器当是圭、璋和璧三类。圭是夏代以来的主礼器，璧的历史更为久远，早在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已经流行。周代的玉璋，不仅见于传世文献，也见于诸铭，然而究竟哪种玉器是周代的玉璋，则迄今仍是个谜，不过多数学者认为考古中所习称的柄形器就是玉璋。柄形器初起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商代袭用，到了西周有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在有些器柄上加琢了凤鸟纹或龙纹，二是在柄前端缀以绿松石、小玉片或蚌片等牙饰。以柄形器的精致与普及程度而言，它与璋的尊崇地位确实是可以相匹配的。

周代用玉传统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瑞与器的互用。圭、璋、璧三种器物不仅是贵族之间相互使用的礼瑞器物，如天子册命诸侯、诸侯或贵族觐见周天子以及贵族的相互聘问，圭、璋都是不可或缺之物；但同时它们也是最重要的礼神之器，如周公祷告祖先，即“植璧秉圭”(《尚书·金縢》)，而宣王祭天，也要“圭璧既卒”(《诗经·大雅·云汉》)。所以汉儒郑玄解释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人执以见曰瑞，礼神曰器”(《周礼·春官·典瑞》郑注)，瑞、器互用，其实也是古人“推己及神”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周代祭祀遗址如侯马盟誓遗址中出土的祭祀用玉，其玉器器类早已超出了“六器”的范畴，举凡玉环、玉璜、带钩、龙形佩饰、人形佩饰乃至残玉片无不可以用作礼神之物，由此可见周人更多的是关注玉的材质，而非器的造型，这也正是《礼记·郊特牲》强调“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的关键所在。

相比夏商两代，周代玉器的一大进步在于用玉的系统化，即以圭、璋、璧为主体的瑞玉系统，以多璜组玉佩和梯形玉牌串饰为主的佩玉系统，以及以玉覆面为代表的丧玉系统。然而，最能代表周代玉文化发展高度的则是禹玉以德，从而缔造出中国古代用玉传统的最高峰——德玉传统。

……

《礼记·聘义》载孔子之语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君子与玉何涉？关键就在于它们各有其德——玉是自然界中最具天地之德的圣洁之物，而君子则是人世间道德的化身，于是玉与君子可以互喻，故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秦风·小戎》)，中国玉文化中的德玉传统也由此而生。

孔子曾经感慨，“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礼记·表记》)。就中国早期玉器而言，夏商的史玉传统与周代的德玉传统，均无愧于“至矣”的评价。而两周以降的玉器与玉文化，或不如虞夏之质朴，或逊于殷周之文质彬彬，因此就总体而言，玉文化在周代以后是损多而益少，再也无法重现三代玉器的荣光。所幸者，华夏民族崇玉、爱玉传统得以延续和保存，而所崇者皆系于玉之德，这即是中国用玉传统中永恒未变的因素。

【故事抄】

云中锦



段文昌

广西师范大学新近出版的《云中锦》是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陆春祥的文化散文。书中通过九篇传记讲述九段轶闻，还原历史上著名笔记作品的幕后故事。段成式、沈括、叶梦得、洪迈、周密、陶宗仪、刘伯温、李渔、袁枚、《酉阳杂俎》《梦溪笔谈》《避暑录话》《夷坚志》《武林旧事》《南村辍耕录》《郁离子》《闲情偶寄》《子不语》，九位文化名人的传奇故事在书中尽显。“当作家与作品彼此观照，当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撞上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作者由此揭开传世名作背后的故事，以及关于作家与作品彼此交织的命运。

平淮碑

元丰三年(1080)正月十八午后，粗大的雪花漫天飞舞，蔡州(今河南汝南)城的北门，来了两人两骑，年长者显得有些疲惫，年轻者看着陌生的地方，却有些新鲜，两人入得城来，匆匆找了家旅店住下。

汴京到蔡州，其实路不远，但这一走就是十八天，他俩正月初一就动身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长江边上离汉阳不远的一个小城——黄州。似乎你也猜出来了，这年长者就是苏轼，前几个月的“乌台诗案”差点让他去了黄泉，被贬黄州做团练副使，至少性命无虞，这不，他带着长子苏迈，一起去黄州。

总归是文人，无论心情如何，走到哪，都忘不了他的诗文。唐朝的蔡州，历史上发生过著名的事件，有块著名的石碑，他一直惦记着，必须去看一看，于是，就有了苏轼的这首诗：“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残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现在，我从宋朝穿越到唐朝，和苏轼一起回到“淮西功业”的场景中去。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不听朝廷命令已经数十年了，元和十二年(817)十月，裴度统一指挥，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吴元济，这震惊了全国，各方节度使随后纷纷向朝廷表示忠心。如此重大胜利成果，一定要刻碑纪念，唐宪宗命同时参加此次战役的行军司马韩愈撰写碑文，韩大师苦思冥想七十天，终于写出了雄文，气势磅礴，文采斐然，宪宗十分满意，立即命人抄写数份，分发各立功将领，并诏令蔡州刻石纪念。这就是苏轼诗中的“吏部文章”。

不想，事情转眼就发生了变化。蔡州的碑立完后，李愬的部将石孝忠，公开将碑砸碎，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死罪呀，然而，皇帝却不追究，反而又让人重写碑文。原来事出有因，那李愬的夫人，是宪宗姑妈的女儿，表兄妹呀，打蔡州，李愬是头功，而韩文却写裴度指挥得好，李妹妹大为不服，天天告状碑词不实，宪宗头都大了，那就将韩文磨去，再写一块。谁来写呢？翰林学士段文昌。

就这样，平淮西碑的韩文碑变成了段文碑。一碑写两次，也算中国碑文化中的稀奇事了。不过，韩愈的碑文可以磨去，纸上的碑文却永久流传，苏轼说它依然散发着“日月光”。我相信，苏轼父子在读碑时，一定有过讨论，也一定感慨万千，但从诗意看，他们都是拥韩者。

北宋政和元年(1111)，汝州来了陈太守，想必他也是拥韩派，这种事估计不用报告中央，又不是本朝的事，他命人磨去段碑，重新刻上韩愈的碑文，不过，已经不是韩愈的原文了。

河南省汝南县政府办的王新立先生，帮我传来了汝南县文管所保存的平淮碑照片，七张图片，均是韩愈的碑文，却没有一张段碑图，但无论怎么说，段文昌的平淮西碑也是被载入史册的，只是这样的方式有些尴尬罢了，不过，这实在由不得他。

段文昌的“饭后钟”

段文昌少年贫寒，有时连饭也吃不上，经常到寺庙里混吃斋饭，但他的祖上段志玄，却是初唐名将，为唐王朝立下大

功，被封为褒国公，陪葬昭陵，入图凌烟阁，荣耀无限。

五代孙光宪的笔记《北梦琐言》卷三，有《段相踏盆莲》，将段文昌这种先苦后甜的生活写得极为生动：

段文昌家住江陵，小时候，段家里很穷，常常担心没有吃的。他家边上有庙，叫曾口寺，每每听到寺庙吃饭的钟敲响了，就跑去蹭吃。时间长了，庙里的和尚都很讨厌他，就改成饭后敲钟。“当当当”，寺庙的吃饭钟又敲响了，段文昌连忙向寺庙方向跑去，到了一看，早已收餐。后来，段文昌发达了，做了荆南节度使，他有诗《题曾口寺》，其中有一句为：曾遇闍黎饭后钟。这个“饭后钟”就这么传开了。

段文昌发达后，生活比较奢侈，他专门用金子打了个莲花盆子，洗脸洗脚。有好朋友就专门写信婉转批评他这种行为，段笑笑说：人生能有多少年好活啊，我一定要满足平生所留下的遗憾。

段文昌因为穷，吃尽了苦头。“饭后钟”，其实，这里面还带着一丝耻辱，寺庙是施舍的地方，除了那些真正的懒汉，谁想要施舍呢？发达后，他仅用诗说说风凉话而已。我猜测，他在任这个大地方的大员时，首先会想到自己穷困的经历，写诗也算是一种减勉，要好好工作，好好努力，再也不要过那种没饭吃的苦日子了。同时，通过故事的流传，他相信，那些寺庙也会引以为戒，今后要更加善待信众，不要将人看扁。自然，段显然不是糊涂人。用金子打造一个盆子，估计也在他的财力范围内，并不过分。

唐代无名氏的《玉泉子》、唐代李亢的《独异志》里，都有这样一则笔记，生动记载了段文昌的傲气。

段年轻时曾在荆楚漂泊，某日，他在江陵某酒肆吃酒，窗外大雨，饮至半醉，起身走路，道路十分泥泞，段见街边有豪华大宅，宅边有水渠，就脱下脏鞋在渠中洗脚。周围聚了一些人，看他洗脚，段毫不理会，趁着酒气，自言自语：等我当了江陵节度使那一天，一定要把这所宅子买下来！大家听了，只是互相笑笑，他们在笑这个穷书生的大话。不想，后来段文昌果然做了荆南节度使，自然，买下房子那是小事了。

有才能加上有志气，终会冒出地平线。段文昌先是娶了宰相武元衡的女儿为妻，这就为他的仕途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后来又受皇帝欣赏，升迁之路极为顺利：两次镇蜀做剑南西川节度使，荆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御史大夫、刑部和兵部尚书这些显赫职位，他都做过，还三朝为相(宪宗、穆宗、文宗)，让他一生荣光。

《新唐书·文艺志》还载，段文昌著有文集三十卷，诏诰二十卷，《食经》五十卷，并传于世。《全唐诗》收有他的五首诗。如此说来，称段文昌为著名诗人也不过分，蜀地著名才女薛涛的墓志铭，就是段文昌撰写的。

成都双流区正兴镇，内府河左岸田家寺，有段公读书台遗址，四川崇州也有一处段公读书台，现在叫龙华山读书台，我在那读到了南宋成都通判何耕的一首诗：“段公曾此读群书，读破应须万卷余。家礼一传为杂俎，稗官收拾附虞初。”前两句写的是段文昌，博学苦读，破万卷书。后两句写的是段成式，老子优秀，这个儿子也优秀，段成式写出了惊世的名笔记《酉阳杂俎》，稗官、虞初，均是小说的代名词。段成式，这就正式亮相。

